

马克思破译人学“斯芬克司之谜”的历程与方法

陈曙光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人是什么”的问题,即人的本质问题,是人学史上弥久而时新的“斯芬克司之谜”。马克思在破解这一千古之谜时,认识是不能深入的。最先提出“理性、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接着又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最后才得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等科学命题。马克思能破译这一千古之谜,关键在于实现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即从唯心史观为基础的方法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从感性存在转变到感性活动;从既定本质上升到生成本质;从单一本质过渡到多重本质;从纯粹理想回归到现实生活;从自我确证跨越到对象互释。

关键词: 马克思; 人学; 人的本质; 唯物史观; 唯心史观

中图分类号: B08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2-0176-07

“人是什么”的问题,即人的本质问题,是人学的“核心问题”。但数千年以来,哲学家们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出发一直未能给予科学的回答,使这一问题成了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而未解的“斯芬克司之谜”。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出发才破译了这一千古之谜,达到了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

一、“人是什么”: 弥久而时新的“斯芬克司之谜”

“人是什么”的问题似乎是一个“自明性”的问题。然而,这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在人学思想史上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以至于到马克思之前,没有哪一位思想家真正科学地回答了“人究竟是什么”这一人所熟知的问题。正如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我们最无知的东西。”人学思想史恰恰证明了“人”即是这样一个东西,“熟知”但却并非“真知”。

简单地回顾一下人类认识自己的思想逻辑便可发现,“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相当久远的问题。古希腊的先哲们早已开始了对人自身的思索与追寻,著名的关于“斯芬克司之谜”的神话朴素地开启了对“人是何物”的追问。“斯芬克司之谜”的意义在于,他借助

神话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初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天真朴素的追问,从此人类文明开启了“认识你自己”这个具有最高价值的课题。

纵观西方人学思想史,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无外乎以下四条不同的路径。

第一,自然本质主义。这条路径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从自然属性的层面探究人与动物之间质的区别。古希腊德谟克利特、依壁鸠鲁认为人的本质是在肉体原子和灵魂原子的结合中产生的。到了中世纪,人文主义者认为饮食男女、趋利避害、追求幸福等是人的天然属性。进入近代,欧洲感性主义人学以人的感性欲望、自然生理要求等自然属性来说明人的本质。费尔巴哈集自然本质主义人性论之大成,他认为人产生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感性欲望、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等都是人的本质。

第二,精神本质主义。这条路径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精神属性,从精神属性的层面探究人与动物之间质的区别。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把人的灵魂、理性抬高到人的本质的地位。这些观点到亚里士多德总其成,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1](59)}，“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2](27)}。近代的理性主义人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尊重理性。笛卡尔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康德也认为自由理性是人的本质,同时把人的理性本

收稿日期: 2007-12-01

基金项目: 湖南社科规划课题“马克思的人学革命与以人为本”资助项目(0602018C)

作者简介: 陈曙光(1975-),男,湖南浏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

质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同意自由理性是人的本质，但他不同意康德把人的本质的实现推到可望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费尔巴哈是感性人学的集大成者，他同时也认为：“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能力，是人之为人的绝对本质。”^{[3](28)}

第三，社会本质主义。这条路径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属性的层面探究人与动物之间质的区别。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是可以受教育的，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而改变的。后来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4}，素朴地猜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欧洲近代哲学大都涉及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如培根认为人的本性有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分，社会本性是人的本质。洛克认为人是有理智和语言的过社会生活的动物。费尔巴哈认为只有社会的人才人，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第四，非理性本质主义。非理性主义人学发现传统理性主义人学过度高扬人的理性的地位，用人的理性本质遮蔽了人的非理性本质。非理性主义人学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在本质上，人是非理性的存在。要把握人的存在，主要不能依靠理性，而要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和主观心理体验。他们高扬人的非理性的地位，从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本能冲动、情感意志、潜意识等来理解人，说明人的本质，认为人的非理性存在状态，甚至完全消极的心理体验，如恐惧、焦虑、死亡等等，才是人的更本真的存在。如意志哲学家叔本华、尼采认为意志是人的本质，意志驱使主宰着理性，他们把情感意志绝对化、神秘化，企图从人的心灵深处独辟蹊径来把握人的本真存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隐藏在深层意识之中的连续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之流；弗洛伊德也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无意识深处的以性欲为核心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他把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源还原于潜意识，从人的潜意识出发来理解人本身；存在主义更是把人看作非理性的存在，孤独的个人通过非理性的情绪体验才能获得存在的概念。

应当说，西方传统人学对人的本质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人的某些属性，诸如理性、意志、爱等等都是人所特有的，确实可以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属性都是抽象的“人自身”的一些特征，都是抛开了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人类个体所得出的结论。也有些思想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这是可贵的。

但是西方传统人学对人的本质的回答之所以是错误的，其病根都在于从抽象的“人自身”出发，将孤立地观察人类个体所得出的人与动物之间外在表象的区

别归结为人的本质，而没有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区别的现实根据。尽管有些思想家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非常狭隘和肤浅的，都脱离了人的生产劳动，离开了生产劳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而往往是从政治关系、自然关系、情感关系、道德关系等来理解人的社会性。这种理解既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为何产生，也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如何发展，更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种社会性不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性，而是成为了人的一种先天的、永恒不变的属性。理性本质主义往往从根本上忽略了人本身仍然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物，甚至于走上了理性的独断，人的理性变成了理性的人，非理性消解于理性之中，否认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作用。非理性人学不知道人不单是非理性的存在物，更重要的是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任何完整的人都必须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浑然统一。无论是理性主义人学用理性去消解非理性，还是非理性主义人学用非理性去遮蔽理性，其结果必然是完整统一的人变成支离破碎的人。

总之，他们不知道，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总是现实的人，只有从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即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去认识人，才可能对人的本质作出科学的界定。

二、马克思破译人学千古之谜的历程

马克思在走出西方传统人学误区的过程中发现：“要真正认识人的本质必须改变思考的出发点，即不是从抽象的‘人自身’，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即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5](98-99)}正是因为这一路径转变，马克思才超越了一切传统人学，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但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陆续提出了如下五个命题：

第一个问题：理性、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

在1841年以前，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还处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这时，马克思把人性主要理解为理性和自我意识。

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精神”^{[6](373)}；人是“自在自为的精神”^{[7](45)}，是一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自我意识。因此，“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自然存在。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而“这种人与自然分

离的观点”，是“属于精神概念本身的一个必然环节”^{[8](92)}。总之，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只不过是精神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即自觉自为地存在的精神。历史只不过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而不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现实的的人的活动。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人，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由此可见，黑格尔所说的人实质上是“抽象的人”，这种人统一于并服从于“绝对精神”。这种观点使黑格尔极度忽视人(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使命，也没有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分的余地。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对黑格尔贬低“自我意识”(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企图用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来改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认为，为了把哲学变成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武器，为了打倒神对人的奴役，就必须提高作为个别自我意识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引用普罗米修斯的话说：“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9](189)}。他从这个观点出发批判了宗教，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他认为，宗教是不合人性的，对上帝存在的任何证明都“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9](285)}。可见，马克思把自我意识看成人的本质，借助于人的自我意识来反对神。显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他反对神灵并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崇拜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立场上。所以，对人的本质就更不可能从实践性活动、从社会关系中去理解。

可见，这个命题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变后的马克思完全抛弃了这个思想，甚至不再使用类似的知性概念范畴。

第二个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正当马克思为物质利益问题所困惑并在世界观方面发生危机时，费尔巴哈哲学宛如一盏明灯，成为马克思继续前进的支点和中介。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是不彻底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0](1)}马克思认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

的幸福。要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只有人类解放，才能真正把人的被异化了的世界和关系还给人类自己，使人成长为真正的人。马克思还提出人类解放的实质在于废除私有制，从而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是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上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0](9-10)}

马克思从宗教的角度来考察，是为了把“人”从神的统治和奴役下拯救出来，在价值上将神的维度还原为人的维度。“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是人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体现，是人的本质物深度复归。这一时期，马克思尽管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自然本质的狭隘层面。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精神”即宗教的批判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方式，对人的本质的表述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语言，仍然停留在抽象理性的层面。

可见，这个命题是人本主义的，但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对宗教神学“神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观点的反对，在价值上将人从神的维度还原为人的维度。

第三个命题：人的类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黑格尔曾经看到了“劳动”，他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和人自我创造的手段，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他的错误在于“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的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了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1](163)}。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是对的，但仅限于精神劳动，只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看作是自我创造的活动，看不到劳动对人、对社会、对精神领域的否定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0](46)}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特有的方式，即实践或劳动。“实践活动是人和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也是产生和决定人的其他所有特性(作者注：如理性、意志、爱)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生命活动

的这种物质生产，和作为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自己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47)}动物的生产是本能的、盲目的和被动的，因而也是片面的和简单重复的，它本身只是自然界的必然之网的一部分；而人则不同，人可以将自然界和自身当作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工具，既改造自然界，也改造自身。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 and 能动的，因而也是全面的、不断超越的、创造性的，是自由自觉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结果和劳动本身被异化了，人的类本质也被异化了，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仅仅成为维持其肉体存在的手段，人不可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假定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才能占有的东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扬弃了异化劳动，消除了人的自我异化状态，人才能变为“真正的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11](120-121)}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劳动，人类迄今为止没有占有过自己的本质，这样人的本质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理想化的东西。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并没有突破人本主义的框框。马克思在后来写作的《形态》中则超越了这种认识，最终冲破了人本主义的桎梏，明确提出了实践性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性。譬如他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0](67)}“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0](68)}更为主要的是，人能够“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是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1](96-97)}。由此可见，把“实践”看作人的本质，成为了马克思的成熟观点。

这个命题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思想成熟后的马克思不再使用“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劳动”或“实践”概念。但这个命题本身揭示的“实践

是人的本质”则是完全正确的，并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阐释。

第四个命题：人

根据人的类本质，只能说明人和动物的区别，无法揭示现实社会中群体、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一概括没有考察到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没有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对人的不同作用。所以，仅仅了解人的实践本质是不够的。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都没有从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黑格尔认为，“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11](162-165)}。费尔巴哈抛弃了“自我意识”的人，企图从活生生的人出发，但是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理性、意志和爱，而且是普遍的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的理性、意志和爱。他离开人所占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来谈恢复人的最高权威，显然是抽象的、空洞的。

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他批评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56)}。马克思突破传统的限制，从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对人的认识的革命性变革。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那么动物之间关系呢？马克思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0](81)}。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存在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关系而是现实的诸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本质离不开同自然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人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决定的，一切现实的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12](6)}，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形成了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行业间的等等复杂的社会交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层次映现着人的社会本质。

具体说，人的社会(群体)本质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人的群体本质的核心是它的社会性。人是社会

关系的承担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同,人类社会是个关系网络系统,各种社会关系规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决定其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倾向和思想观点等,人的社会本质正是在这种区别中表现出来的。第二,规定人的社会本质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又是复杂多样的,所以,必须用系统论的方法,从总体上把握、从多层次的角度上分析和考察,才能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第三,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人的社会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抽象不变的本质是不存在的。

可见,这个命题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完成后的完全科学的命题。

第五个命题: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都没有发现人的实践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因是人的需要。人作为个体存在物,人的需要是人的自身的规定,个人之间的需要千差万别,他们必然具有把不同个人相互区别开来的内在的特殊的规定性,“每个人的需要不同,他们的理想、目的和任务也就不同,从而他们得以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一般来说也可能不同,因此也就可能成为不同样式的人”^{[13](299)}。马克思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有了某种职责和某种任务,他们才可能成为不同的‘我’。”^{[14](326)}这样,个人独特的需要便是人的个体本质。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14](514)},“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11](37)}。在这里,马克思是直接把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作为同一的概念来使用的。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而必须投身于生产;第二个事实是:得到满足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又引起新的需要……。这里,马克思不仅赋予需要以前提性,而且赋予它以普遍性、永恒性和能动性。这就指明了,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最终动力和内在根据。人的需要的内容和满足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15](492)}。人的一切需要都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我们既可以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认识不同时代的人的需要的内容和满足方式,又可以从人的不同

的需要内容和满足方式中区分不同时代的人的本性。“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1](132)},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16](174)}。

人的需要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人的需要产生于主体自身的结构、规定性和主体同周围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需要是人的生命存在、发展和延续的直接反映,是人体包括人脑机能的客观要求。因此,它本质上是自然物质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的需要又是历史地形成的,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从主体同周围世界的联系看,需要总是指向外部环境的某个对象,并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取得或创造能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对象。人们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决定着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需要。人的需要有着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人每时每刻都把自身作为意识的对象,因而他的需要总是被意识到的需要,必然反映为他的意志,以欲望、目的、动机等意识形式而存在。这种情况就使得人们往往“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17](516)},把需要看作是人的意识或意志的产物,看作是人们先天固有的、主观的心理感受。可是,“需要本身和需要在头脑中的反映是不同的”^{[18](25)}。“他们不知道,表现在人的愿望、目的、动机、意志等意识形式中的人的需要,不是人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他们也不知道,人的需要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是客观现实存在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在头脑中的能动的反映,都可以找到它的客观根据”^{[5](195)}。

人的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在根据,人的一切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4](286)}。需要的满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通过人自己有意识的活动生产和创造出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人也创造属人的社会关系,需要的满足过程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是人之为人的原因和根本,是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动植物尽管也有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完全是一种生物的本能,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人的需要作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全面规定着人的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

可见,这个命题是一个很深刻、也很科学的命题,也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

甚至认为这一命题“不仅涵盖了前两个界定的内容，而且揭示了前两个界定的原因，在不少方面超越了前两个界定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一界定，是对前两个界定的综合”^[18](24-25)]。

那么，马克思后三个命题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它们是相互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人的本质应当贯彻三者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活动的具体的历史形式，它的性质和变化都是由实践活动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离开实践活动，就不可能产生人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人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具体本质，剩下的只是空洞的“类”的抽象。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作为人们活动的组织方式，又是人得以存在和人的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和人类活动都是不存在的。最后，人的实践和人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背后的物质动因是人的需要；离开了人的需要，人的实践和社会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人身上，实践活动是内容，社会关系是形式，人的需要是动力。只有正确地理解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上考察人的本质，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才能从中揭示人之所以人的特殊本质和内在根据。

三、方法论革命：马克思破译人学“斯芬克司之谜”的关键

从前面的五个命题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一开始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认识人的本质的。马克思最初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同样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来规定人的本质，提出理性、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后又转向费尔巴哈派，用人本主义的方法来规定人的本质，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马克思在从唯心史观通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最后马克思才在科学的意义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规定人的本质，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等命题，达到了对人学“斯芬克司之谜”的科学回答。所以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科学解答人学“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即从唯心史观为基础的方法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场方法论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感性存在转变到感性活动。马克思在研究人的本质的时候，并非一开始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人是自我意识的人。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和认识还处于幼发时期的抽象人性阶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但还只是达到了对人的感性直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第一次对费尔巴哈视野中的“人”展开了批判，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所分析的“人”是“抽象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而“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可见，正是因为研究对象从抽象的人转变到了现实的人，马克思才有可能破译“人是什么”这一千古之谜。

第二，从既定本质上升到生成本质。当马克思把理性、自我意识看成人的本质时或者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时，马克思并没有从人的实践性活动、从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也就是说，没有从生成性的视野、历史性的角度、“动词性”的眼光去审视人的存在本质，而是从现成性的视野、“名词性”的眼光去审视人的存在状态，把人看成是既成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只是一种既定本质。后来，马克思转变了审视人的角度，把“实践”“社会关系”和“需要”界定为人的本质。而“实践”“社会关系”和“需要”，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某种既成的存在物，而是永在途中，是具体的、历史的生成物。可见，马克思探索人的本质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从既定本质上升到生成本质的方法。

第三，从单一本质过渡到多重本质。传统西方人学对人的本质的回答大致有三条路径，即自然本质主义、精神本质主义、社会本质主义和非理性本质主义。他们都遵循单一的思维方式，试图从实体的角度给人下定义，找到人的某种单一的本质。但现实的人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人，它不是单质的存在物，而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思想与行为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多元的，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从人作为个体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的个体本质。可见，马克思科学破译人学“斯芬克司之谜”的过程体现了从单一本质过渡到多重本质的方法。

第四，从纯粹理想回归到现实生活。1845年以前，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主要是以理想人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人本主义哲学，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理想的人”。马克思发现，在资

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结果和劳动本身被异化了,劳动仅仅成为维持其肉体存在的手段,人不可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扬弃了异化劳动,消除了人的自我异化状态,人才能变为“真正的人”。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变成了一种纯粹理想化的东西。1845年以后,马克思显然回归了生活世界。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应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这些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只属于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任何社会形态里的人都占有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人的本质。同样,“需要”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需要,是自然物质长期进化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是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综上所述,马克思探索人的本质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从纯粹理想回归到现实生活的认识方法。

第五,从自我确证跨越到对象互释。当马克思把理性和自我意识理解为人的本质时,只局限于从人自身寻找人的本质,只限于从纯粹主体出发来确证主体自身的本质,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人的一种属性。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中,还是依靠主体来确证自我的本质,而不是对象性的规定或关系规定。马克思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历程中,逐渐地抛弃了自我确证的方法,而转向了对象互释的辩证方法,即把主体与客体放在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借助于客体对主体加以规定,从中揭示人的本质。马克思把“劳动”、“社会关系”、“需要”作为人的本质的规定,使主体纳入了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根据感性——对象性的原则,

通过对象来对人加以规定,在关系中、在客体中把握人的本质。所以,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过程中体现了从主体自我确证人的本质到主客体互释中规定人的本质的方法论转向。

参考文献:

- [1] 加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2]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 [3]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5] 陈志尚, 王善超. 人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6]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 [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8]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2]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孙鼎国. 世界人学史(第四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18] 赵家祥.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界定[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5(7).

Karl Marx's route and method in answering Core Questions of Hominology

CHEN Shugu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 is the first person raising five relative conclusions when exploring Human's Riddle, of which self-consciousness, thoughtfulness are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 and "Human is the higher essence of human be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 is the self-conscious activity";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 is the summary of hi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What man needs is his essence". The contribution of Karl Marx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riddle l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methodology—from historical ideal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Marx's Hominology; Human's Essen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idealism

[编辑: 颜关明]